

从明清戏文看闽南方言假设连词“卜”的来源*

——兼论汉语假设连词“要”的来源

陈曼君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闽南方言假设连词“卜”是意愿助动词“卜”在非现实的语境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具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不仅是语用原则在起作用,而且是推导义固化的结果。意愿助动词“卜”语法化为假设连词“卜”的过程,也是“卜”的语义由主语指向转向说话人指向的过程。意愿助动词“卜”发展为假设连词“卜”的语法化路径具有类型学意义,为我们重新探索汉语假设连词“要”的来源提供了活生生的范例。文章通过考察,揭示了中西方语言在助动词向虚拟成分演化方面存在的共同之处和根本差异,并阐释了根本差异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 明清闽南戏文; 闽南方言; 假设连词; 类型学

[中图分类号] H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442(2023)03-0090-18

doi: 10.19888/j.issn.1001-5442.2023.03.010

一 引言

陈曼君(2015:175)指出:“‘卜’是民间常见的写法,但并不是它的本字,目前本字未明。从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2008:152)看,表示‘要’义的‘卜’,在汉语方言里分布的地域非常狭小,主要集中在中国闽南一带以及台湾地区……‘卜’在闽台地区较多的是读为[beh],此外泉漳台内部不同地区还存在不同的读法,具体见表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闽台闽南方言语法比较研究”(13BYY048),第48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海峡两岸闽南方言语法比较研究”,福建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语言地理学视角下的闽台闽南方言副词研究”(FJ2020B129),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闽南方言文化资源保护与应用研究”(JSZM2020029)。承蒙汪维辉等先生和《古汉语研究》编辑部、匿名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表 1：闽台闽南方言“卜”的读音

	泉州	厦门	漳州	台湾
“卜”的读音	bəh ⁴ /boh ⁴	beh ³²	beh ³² /bueh ³²	beh ²¹ /bueh ²¹ /bəh ²¹

据陈曼君 (2015:175–176) 研究, 在早期闽南方言戏文里, 助动词“卜”有两个句法位置, 第一个是置于谓语动词前做状语, 与谓语动词一起构成“NP+ 卜 + VP”句式; 第二个是置于谓语动词后做补语, 其后带 NP, 一起构成“NP1+ VP+ 卜 + NP2”句式。本文要讨论的是与第一个句法位置有关的“卜”。

在当代闽南方言里, 跟第一个句法位置有关的“卜” (以下简称“卜”) 主要有以下几种用法:

1. 【动词】希望得到; 想要: 伊 ~ 复印纸。(他要复印纸。)
2. 【助动词】^① a. 表示做某件事的意志; 想要: 我 ~ 食饭。(我要吃饭。)
- b. 将要: 雨 ~ 落喽。(快要下雨了。)
3. 【假设连词】如果: ~ 阿姊喝去, 我亦喝去。(如果姐姐不去, 我也不去。)

在《台湾闽南语辞典》(董忠司 2001:54) 里, “卜”只有 2、3 的用法; 在以厦门、泉州、漳州闽南方言为描写对象的《闽南方言大词典》(周长楫 2006:693) 里, “卜”包括了 1、2、3 的用法。的确, 在台湾闽南方言里, “卜”很难单独用为意愿动词, 表意愿义时, 它总是与同义成分“捏 [tih¹³]^②”组成复合动词“卜捏”。而闽南三地方言虽然至今还保留着“卜”单独作意愿动词的用法, 不过更多的时候也把意愿动词双音化为“卜捏”^③。三种用法中, 闽台闽南方言都是以第二种用法最为常见。“卜”共存于现实闽南方言口语中的这三种用法, 正是“卜”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语法化的结果。其实, “卜”的这些用法早在明代已经出现了。但是, 我们仍能从明代以来闽南方言宝贵的历史文献和现实方言中找到“卜”的语法化线索。本文要着重探讨的是闽台闽南方言假设连词“卜”的来源, 将借助历史文献^④和现实语料^⑤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 “卜”的 2、3 用法之间有着怎样的演变关系? 是通过什么机制和途径来实现这种演变的?

第二, 本研究对解决汉语假设连词“要”的来源问题有何意义和启示?

第三, 中西方语言在意愿助动词发展为虚拟成分的道路上有何共性和个性?

二 关于闽南方言假设连词“卜”来源的研究

关于闽南方言假设连词“卜”的来源, Chang, Miao-Hsia (下文简称“Chang”) (1999、2009) 曾经涉足过。Chang (1999:387–407) 认为, beh^⑥ 所表示的非现实的条件可能是其由意愿向主观化和认识功能发展的体现。后来, Chang (2009) 进一步指出, 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 beh 已经用来表条件了, 或者单用, 或者与条件标记^⑦ na^⑧ 复合为 nabeh 或 behna。尽管 beh 可以和条件标记 na 互相替换, 但是 beh 似乎是首选非真实性和假设性

突出的语境,如例(1)。nabeh 出现于句首时,是一个纯粹的条件标记,如例(2)。nabeh 出现于主题之后时,兼有表条件、表意愿、表将来的混合义,如例(3)。下列是其原文中举的三个例子^⑨:

(1) 这一枝花障香,卜掞除可惜。(这朵花这么香,如果扔掉可惜。)(嘉靖刊《荔镜记》24.050、051)

(2) 那卜是益春打破,叫益春出來。(如果是益春打破,就叫益春出来。)(嘉靖刊《荔镜记》19.288、289)

(3) 伊那卜力汝送官,许时老个便来照顾汝。(他如果要把你送到官府去,那时我就来照顾你。)(光绪刊《荔枝记》15.049)

基于 Chang(1999:387–407) 的上述认识, Chang(2009) 因此认为转喻化使表意愿的意义和表条件的意义联系起来。她同时指出,例(3)(nabeh) 的混合义是其处于意愿义和条件义两种意义之间的中间阶段的表现。beh、nabeh 上述所有功能在历史上的闽南方言和当代的闽南方言都存在。

Chang 上述关于 beh 向条件标记发展的讨论尚有较大不足,给本文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

首先, Chang 承认条件标记由意愿义演变而来,条件标记和意愿义之间出现过渡阶段,但这个过渡阶段不只是条件标记和意愿义共存,还同时与将来义共存。为什么在意愿义向条件标记发展的过渡阶段会出现将来义,是否将来义还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 Chang 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说明。事实上,例(3)中的“那卜”也很难解读出将来义,将之解读为“如果”或者“如果要”会比较合适。我们认为例(3)很难解读为将来义,并非否认“卜”存有将来义的事实,而是认为在意愿助动词向假设连词发展的过程中,很难经过将来义这一表估计、主观性很强的阶段,因为“卜”从意愿助动词到假设连词这一发展过程,其主观性是渐渐增强的。况且,助动词“卜”不管是在明清时期的闽南方言,还是在现代的闽台闽南方言,想要义都是其使用得最多、发展得最为成熟的一个义项;而将来义在早期闽南方言里则是其使用频率较低的一个义项。Chang(2009)做过统计,在其统计的 16–19 世纪闽南方言文献里的 730 个“卜”用例中,意愿义助动词占有 440 个用例 60.3 % 的使用率,假设连词占有 85 个用例 11.6 % 的使用率,将来义助动词只占有 65 个用例 8.9 % 的使用率。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歌仔册以及当代闽南语口语自然语料相比,将来义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分别上升到 9.4 % 、 16.7 % ;假设连词的使用频率则越来越低,分别下降到 6.1 % 、 1.6 % 。这说明,将来义助动词处于发展期,假设连词已发展成熟并处于衰微期。使用率高的最容易语法化,而使用率较低的将来义助动词语法化为使用率比它高的假设连词,可能性较低。

其次, Chang 认为意愿义发展为条件标记是转喻起的作用,但转喻如何起作用,文中并未进一步讨论。

第三, Chang 虽然指出存在着例(1)、例(2)、例(3)所代表的三种情况,即: 1. beh 主要用于非真实性和假设性突出的语境; 2. 处于句首的复合词 nabeh 是一个纯粹的条件标记; 3. 处于主题之后的复合词 nabeh 是条件义、意愿义、将来义的混合体。然而这三种情况在 beh 演化为条件标记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它们之间有何关联,文中也没有进行梳理。与此同时,例(1)中的“卜”还包含意愿义; 处于句首的复合词 nabeh 也未必是一个纯粹的条件标记,如下文的例(11)。诸如此类的问题令我们觉得很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三 闽南方言“卜”从意愿助动词到假设连词的语法化历程

正如 Chang(2009) 所说的,表假设等功能的“卜”存在于历史上的闽南方言。的确,假设连词“卜”早在嘉靖版戏文已经出现了。它的发展经历了下述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不仅在明清戏文里普遍存在,而且就是到了现代,在有些地方的闽南方言如惠安方言里也依然普遍存在。不过,在对现实闽南方言的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有的闽南方言如永春方言里的“卜”并没有假设连词的用法,即并没有下述第三、第四两个阶段里的用法。这显然是闽南方言内部发展不平衡的体现。

闽南方言“卜”向假设连词发展,不仅是语用原则驱动的产物,而且是推导义固化的结果。

3.1 助动词“卜”出现于非现实句,表“如果想要”

助动词“卜”是由表想要义的意愿动词“卜”发展起来的,之后又衍生出“将要”“恐怕”“会”等义项(陈曼君 2017)。不管是明清时期的闽南方言,还是在现代的闽台闽南方言,表“想要”义的意愿助动词“卜”都是助动词“卜”中使用得最多、发展得最为成熟的一类。大多数情况下,意愿助动词“卜”出现于非假设句,句中的“卜”表达的是主语指向情态,如例(4)、例(5)这类句子中的“卜”所表达的意愿都分别指向主语“阮”“你”。

(4) 阮卜入去。(我要进去了。)(嘉靖刊《荔镜记》22.141)

(5) 你是也人,卜力阮?(你是什么人,想要抓我们?)(嘉靖刊《荔枝记》43.013)

有时,意愿助动词“卜”也可以出现于表假设关系的紧缩复句:

(6) 向说,待小妹为尊兄你收。卜使来提。(这样说,小妹就为尊兄你收下了。如果想要用就来拿。)(嘉靖刊《荔镜记》25.214)

(7) 卜入来便入来,乞阮惊一头冷汗都滴。(如果要进来,就进来,让我吓得一头冷汗都滴出来了。)(嘉靖刊《荔镜记》29.118、119)

(8) 阮卜食畏无?(我如果要吃,怕没有呀?)(顺治刊《荔枝记》9.234)

这三个例子都是无标记的假设句,这种特定的语境为“卜”虚化为假设连词创造了句法和语义条件。这类句子中的“卜”就它的字义而言,表想要义,但由于它身处非现实句,又处于假设连词的位置上,非现实的语境和具体的句法位置同时又让它承载着假设

义,这是特定的语境赋予“卜”特殊隐涵义——假设义。因此,“卜”在句中比较准确的意义是“如果想要”。这是“卜”向假设连词靠拢的第一步。这三个例子里的“卜”,其语义已经不再完全指向主语,而是开始带上说话人的主观意见了,所以“卜”的语义在指向主语的同时也有点开始指向说话人的意味了。

3.2 助动词“卜”与假设连词组合,表“如果想要”

由于“卜”在非现实句中所表示的假设义是潜藏起来,比较隐晦、含糊的,为了增加明晰度,提高表达力,“那”或“若”等假设连词便应需而入,与“卜”组合,一同表示假设义。这时句中的“卜”尽管隐含着假设义,然而它还是一个有实在意义的助动词,仍然还表“如果想要”义。例如:

(9) 娘仔那卜磨镜,请出来。(娘子如果想要磨镜,就请出来。)(嘉靖刊《荔镜记》19.10)

(10) 再后若卜障做,定是讨死。(以后如果还要这样做,一定是找死。)(嘉靖刊《荔镜记》22.378)

与3.1小节里的例子不同的是,这类句子中出现了“那”“若”之类假设连词,如此便把句子的假设义凸显了出来。词与词的搭配有个语义相宜性的问题,“那”“若”之类假设连词的出现,制约着“卜”语义的演变方向,对“卜”的进一步虚化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这类句子假设的意味较之例(6)至例(8)类句子的浓,因此句中“卜”的语义指向主语的程度就比后一类句子低,而指向说话人的程度则比后一类句子高。

由表“如果想要”的“卜”向表“如果想要”的“那卜/若卜”发展,是语言中的“省力”原则和“尽力”原则^⑩相互对抗、相互竞争、互为平衡的产物。

3.3 “卜”与假设连词组合,表假设义

沈家煊(2004)指出,一种十分重要的语义演变过程是 PCI>GCI>SM,即词义引申是从“特殊隐涵义”开始的,用例不多,要靠语境来逐步推导,后来这样的推导反复进行并且扩散开来,不需要靠语境和逐步的推导就可以直接得出相关的隐涵义,其地位也就变成了“一般隐涵义”。“一般隐涵义”再进一步固化,就变为语词的“固有义”(semanticized meaning,简称 SM)。这在闽南方言“卜”向假设连词的演化中得到印证。

一开始,“卜”的假设义是一种“特殊隐涵义”,是从特定语境推导出来的。后来,这样的推导反复进行,加上它与“那”“若”等假设连词组合以后,其意义受假设连词的语义牵引,便不需要靠语境和逐步的推导就可以直接得出相关的隐涵义,这时“卜”的假设义就由特殊隐涵义变成一般隐涵义。“卜”的假设义由特殊隐涵义变为一般隐涵义也就意味着其假设义由隐性变为显性了。当然,“卜”的假设义能否由隐性变为显性,还取决于“卜”后 VP 的语义特征以及后一结论分句的语义表达。

意愿助动词“卜”用于非假设句时,其后 VP 都具有[+自主]的语义特征。但是如果“卜”用于假设句,其后的 VP 也同样具有[+自主]的语义特征时,它就不一定是意愿

助动词了。因为“卜”用于假设句与用于非假设句的情况有所不同：用于非假设句时，其后通常是没有后续分句的；用于假设句时，其后必须有后续分句。这样，用于假设句的“卜”究竟是何词性，就得看“卜 VP”的后续分句的语义表达了。像例(7)、例(8)中“卜 VP”的后续分句分别是“便入来”“畏无”，所指的都不是已然行为，这时句中的“卜”仍可以表“如果想要”义，仍然可以做意愿助动词。而像下面这两个例子则情况有别了：

(11) 那卜共阮爹妈说，叫：伊着死……(如果 / 如果要跟我爸妈说，就说：他得死……)(嘉靖刊《荔镜记》24.306、307)

(12) 你兄那卜做运使，向说你便是叔爹了。(你哥哥如果当了运使，那样说你就是叔爹了。)(嘉靖刊《荔镜记》26.318、319)

这两个例子代表两种情况。例(11)中“卜 VP”的后续分句“叫：伊着死”，只是一个警告，并不是一个结果，这样始发分句所指行为可以是假设已经实现，也可以是假设想要执行，所以这个例子中的“卜”可有两解，或解读为假设连词，或解读为“如果想要”义。这时，“卜”的假设义处于半显性的状态，这也是“卜”由助动词演变为假设连词的第二、三个阶段的过渡阶段。例(12)中“卜 VP”的后续分句“向说你便是叔爹了”是假设始发分句所指的行为已经实现后的结果，这样就限定了始发分句中的“卜”只能有一解，即只能解读为假设连词。如果还把“卜”解读为“如果想要”义，前后分句的语义便会产生冲突。

如果“卜”后的 VP 具有[—自主]的语义特征，“卜”的意义就彻底虚化为假设连词。在明清戏文乃至现代闽南方言里，“卜”作为假设连词用时，其后的 VP 主要是那些具有[—自主]语义特征的动词，诸如“是”“有”“无”“生(长)”“亏”“失误”“知(知道)”“在”等。例如：

(13) 那卜是，都通来去认伊。(如果是，就可以去认他。)(顺治刊《荔枝记》9.65)

(14) 那卜是阮简仔打破，共你无干。(如果是我的奴婢打破，就跟你无关。)(嘉靖刊《荔镜记》19.256)

(15) 人那卜知，你就着死。(如果被人家知道了，你就得死。)(顺治刊《荔枝记》11.388)

(16) 我那卜有许心，肯来恁厝做只校当。(我如果有那心，怎么肯来你家做这等差事。)(光绪刊《荔枝记》29.43)

由于“是”“知”“有”之类词所指的都是一种非自主的状态，完全不能被处置，因此句中的“卜”不再表实在的意义，而是向其前的假设连词“那”靠拢，彻底虚化为假设连词，并与“那”等假设连词共存于一个句子里。只有这时，“卜”的假设义才彻底显性化。

到了近现代闽南方言，甚至还有“卜那”“卜若”作假设连词的用法。例如：

(17) 我卜那知紧到位。(我要是知道就赶紧赶到那里了。)(《歌仔册·三伯探英台歌》96 b 2.27)

(18) 卜若挖有着就开袂了啊。(如果挖得到就花不完了。)(《云林县闽南语故事集

“卜”彻底虚化为假设连词后,所表达的假设完全是说话人个人的假设,其语义已经完全指向说话人了。“卜”虚化为假设连词后,这一用法的反复使用又会使它的假设义得到进一步固化。

3.4 “卜”单独表假设义

假设连词“卜”与“那”等其他假设连词同义组合,共存于一个句子里,必然存在着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其中的一个假设连词常常会挤掉另一个假设连词。有时,是“卜”战胜了其他假设连词,单独承载着假设义。例如:

(19) 卜挨着阮简仔,也剥食了。(要是扔到我的奴婢,也就剥起来吃掉了。)(嘉靖刊《荔镜记》26.390)

(20) 老爹卜知,打尔个脚川。(老爹如果知道,就打你的屁股。)(光绪刊《荔枝记》36.41)

在明清戏文里,“卜”单用为假设连词的情况比较少见。它更多的是与“那”等其他假设连词共存。单用时,假设连词“卜”与“那”之类假设连词相比,处于绝对的弱势。具体见表2。

表2: 明清三戏文各假设连词出现次数和使用比重

	假设连词“那卜/若卜”	假设连词“卜”	假设连词“那/若”
嘉靖《荔镜记》(1566)	33 / 29.73%	3 / 2.70%	75 / 67.57%
顺治《荔枝记》(1651)	38 / 20.65%	6 / 3.26%	140 / 70.09%
光绪《荔枝记》(1884)	35 / 20.83%	5 / 2.98%	128 / 76.19%

表2显示,在明清三个戏文里,三类假设连词的使用体现了这样的发展态势:“那卜/若卜”所占的比例大体呈下降趋势;“卜”所占的比例起伏不大,从明代到清代只略微上升,之后又略微下降;而“那”/“若”所占的比例则节节攀升。这表明,假设连词“那卜/若卜”的组合到了嘉靖时期已经发展到巅峰,而这时期的假设连词“卜”才处于发展时期,不过因为假设连词“那/若”强劲的发展势头远远盖过假设连词“卜”,致使假设连词“卜”的发展势头后劲不足,乃至到了近现代闽南方言,假设连词“卜”的使用率越来越低。如上所述,据Chang(2009)统计,从16-19世纪闽南方言文献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歌仔册以及台湾现代闽南语口语自然语料,假设连词“卜”在“卜”所有用例中的使用率分别由11.6%下降到6.1%、1.6%。当然,各地闽南方言使用假设连词“卜”的情况也会有所不同。

四 关于汉语假设连词“要”的来源

闽南方言意愿助动词“卜”发展为假设连词“卜”的语法化路径在汉语中具有类型学

意义,对推动汉语同一领域的研究起到积极作用。它既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汉语假设连词“要”的来源问题,又对我们另辟蹊径来探讨汉语假设连词“要”的来源问题富有重要的启示。

4.1 关于汉语假设连词“要”来源的研究

关于假设连词“要”的来源问题,太田辰夫(1987),蒋冀骋、吴福祥(1997),马贝加(2002),古川裕(2006),蒋绍愚(2015:366–368)等都有涉足。他们几乎都认为假设连词“要”是由意愿助动词“要”演变而来的。由于古川裕(2006)这方面的研究与其他学者差别较大,这部分暂且不论及,而留到第五节再作讨论。下面只对上述其他学者针对假设连词“要”产生的年代和“要”如何由意愿助动词语法化为假设连词这两个问题的研究进行点评。

“要”的假设用法究竟产生于何年代,上述学者除了蒋绍愚(2015)外都有触及,但是众说不一。太田辰夫(1987:307)认为,“要”用于表假定是在清代。其举例摘录如下:

(21) 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庚辰本《石头记》24)

(22) 这首诗要使得,我就还学;要还不好,我就死了这做诗的心了。(亚东版本乙本《红楼梦》49)

蒋冀骋、吴福祥(1997:518)认为,假设连词“要”最早见于宋代文献。其举例如下:

(23) 然没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

(24) 要与贤说无,何故圣人却说有,要与贤说有,贤又来问某讨,说只说到这里,要人自看得。(《朱子语类辑略》卷一)

(25) 又曰:“性最难说,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长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同上)

马贝加(2002)则认为,假设连词“要”发端于汉代,如例(27);到了唐代,唐诗中有较多的“要”用于假设复句中的例子。在其举的例子中,其认为“要”是真正的假设连词的是下例:

(26) 要君意若此,终始莫相轻。(张说《杂诗四首》)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要”真正算得上假设连词的只有太田辰夫(1987:307)举的例(21)、例(22)。例(23)至例(26)里的“要”根据上下文解读起来都仍然还是意愿助动词。假设连词用于偏句是提出假设,其后的正句表示的则是假设实现后所产生的结果。从例(23)到例(26),前后分句并没有遵循这一逻辑关系。这些例子里的后一分句都在阐明说话人的一种态度、观点和看法,立场鲜明,这显然跟前一分句被隐含的主语所指或者说话人的主观意愿有关。当说话人针对主语所指的主观意愿来阐明自己的立场时,往往是阐明实现这一主观意愿的唯一前提条件,如例(23)。当说话人针对自己的主观意愿来阐明自己的立场时,可能是对自己施行这一主观意愿的矛盾心态的袒露,如例(24),可能是对自己施行这一主观意愿的一种评价,如例(25),也可能是自己施行这一主观意

愿的一种目的,如例(26)。如果将上述例子里的“要”硬生生地解读为假设连词,就不符合逻辑事理。也就是说,就上述例子而言,“要”不管是在唐代,还是在宋代,都仍然无法解读为假设连词。连例(26)中的“要”都非假设连词,更勿论例(27)了。那么,“要”作为假设连词的用法是否像太田辰夫(1987:307)说的那样直到清代才产生呢?这将有待于下面进一步论证。

关于“要”是如何由意愿助动词语法化为假设连词这一问题,除了蒋冀骋、吴福祥(1997)外,太田辰夫(1987)、马贝加(2002)、蒋绍愚(2015:366–368)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相比起来,马贝加(2002)的研究详细一些。马贝加(2002)认为,假设连词“要”的孕育期是在汉代,至魏晋时期已经萌生。下面是她所举的其中两个例子^⑪:

(27) 侯草木之区别兮,苟能实其必荣;要没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汉书·叙传上》)

(28) 太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三国志·魏书·高柔传》)

马贝加(2002)认为,这两个例子中的“要”都有两解,可释义为“想要”,也可以释义为“若要”^⑫,“这表明能愿动词‘要’与假设连词‘要’,曾处于相同的句法结构中,而且,两者在词义上有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假设连词‘要’脱胎于表示主观愿望的能愿动词‘要₄’”。“一个‘要’字,兼有假设连词和能愿动词的意义和功能。汉语词汇的虚化过程,经常看到一个词汇形式揉合两种意义、两种功能的现象。或者说,一个义位附着于另一个义位的情形。在语法化进程中,这个词汇形式将舍弃其中一个功能,演变为只有一个功能的词。‘要’的语法化也走过这样的历程”。

举汉代、魏晋时期的用例之后,马文(2002)又举了唐代用例、宋代用例。唐代用例除了举例26外,也举了下面两个她认为可释义为“想要”或“若要”的用例:

(29) 要觅长生路,除非认本元。(吕岩《五言》)

(30) 要主君臣义,须存子母心。(同上)

宋代用例马文(2002)引用的是蒋冀骋、吴福祥(1997:518)所举的例(23)至例(25),认为例(24)、例(25)中的“要”是假设连词的同时,还看得出“若+要”的痕迹,只有例(23)的“要”是确定无疑的假设连词。

此外,马文(2002)还举了例(31),指出:“此例的‘要’可以释义为‘若、若是、如果’或‘只要’,也不妨释义为‘应该、应当’,由此例可见,假设连词与表示事理应当的能愿动词‘要₃’也有一定联系。”但是“可以肯定假设连词‘要’主要源自表示主观愿望的能愿动词‘要₄’。”

(31) 礼还,复有诏责数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曰:“……共定大业,整齐天下,当复有谁?凡百事要所当损益,乐闻异计,匡所不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从马文的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一些不足。首先,马文将“要”兼有“想要”和“若要”两种

意义,视为“兼有假设连词和能愿动词的意义和功能”,显然是将表“若要”义的“要”视为假设连词,这无疑是不妥的。“若要”离真正的假设连词“若”尚较大的距离。其次,马文对助动词“要”语法化为假设连词“要”的讨论比较零散,也未能给出一个清晰而合理的解释。在“要”由助动词向假设连词演变的过程中,马文涉及到两个并存阶段,一个是“想要”义和“若要”义的并存,一个是“若要”义和“若、若是”义的并存。此外,马文也提到在语法化进程中会因舍弃其中的一个功能而打破并存的局面。但是如何打破,又如何实现“要”从“想要”义阶段到“想要”义、“若要”义并存阶段,从“想要”义、“若要”义并存阶段到“若要”义、“若、若是”义并存阶段,乃至从“若要”义、“若、若是”义并存阶段到“若、若是”义阶段的一步步演化,马文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讨论。第三,马文对古代汉语文献的解读有值得商榷之处,如上所述。

太田辰夫(1987:307)指出假设连词“要”出现的年代的同时,也对假设连词“要”最初出现的语境和后来的发展做了粗略的说明:“‘要’用于表假定是在清代,开始只限于用在表示人的主语之后。可能不久它占了优势,就取代了在它以前的‘若’‘若是’吧。”如例(21)便是。太田辰夫(1987:307)把例(22)中的“要”称作“用于表纯粹的假设的用法,至少不是当初的用法”。此外,他还注意到“若要”的用法:“若要这个词常常是两个词,是‘若欲’(如果想要做……)的意思,又成为一个词,也用作单纯表假设的连词,但是不能区分的例子很多。”其举例摘录如下:

- (32) 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红楼梦》64)
(33) 一个若要使起家人们的钱来。便了不得了。(《红楼梦》114)

太田辰夫(1987:308)进而指出:“可以认为,先有这种‘若要’,后来把它看作是两个同义词的复合,就变成单用‘要’也能表假定的了。这一点还要留待将来研究。”

太田辰夫点出“若要”的存在及其用法很有价值。尽管他未能将之与助动词“要”发展为假设连词“要”这一语法化历程结合起来探讨,同时后来也未见到其有进一步的讨论,但是这却对我们进一步探讨汉语“要”是如何由助动词语法化为假设连词这一问题富有启发意义。

蒋绍愚(2015:366-368)认为,“要”由表意愿的情态动词演变为假设连词是“语境吸收”的结果。他举了下面的例子:

- (34) 易是变易,阴阳无一日不变,无一时不变。庄子分明说“易以道阴阳”。要看易,须当恁地看,事事都是那阴阳做出来。(《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蒋先生指出:“这种‘要’是情态动词,表示直观意愿。但这种‘要……’的句子,后面还有后续句,即:句A,句B。句A表示要做某事,句B表示会遇到某种情况。句A是假设的条件……句A中的‘要’……既然是在假设句中,‘做某事’就必然是一种设想的行为……有没有情态动词‘要’都一样。所以,在这种句式中,‘要’的语义逐渐淡化……这种‘要’经常出现在假设句中,久而久之,人们会认为‘要’的作用是表示假设。”据此,

他推演出“要”的演变过程：

1. 要看易 = 欲看易 “要”原来的意思是“欲”。
2. 要看易 = (若) 欲看易 但“要看易”是假设句的上句, 所以可加上“若”。
3. 要看易 = 若看易 “要”的原义“欲”淡化, 吸收语境义“若”。

蒋先生进一步解释道：“这种由语境吸收而产生的意义逐渐固化, 成为‘要’的固定词义。到后来, ‘要’就可以作为一个假设连词用了。”蒋先生同时强调, 由“语境吸收”而产生的词义演变, 是句法和词义共同影响的结果。在蒋先生看来, “要”演变为假设连词, 吸收了它经常所处的假设语境义, 这是句法对其词义演变的影响; “要”演变为假设连词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要”意愿意的弱化以至消失, 这是词义变化对其词义演变的又一影响。

蒋文 (2015:366–368) 的可贵之处, 是指出语境和词义变化对“要”演变为假设连词的双重影响, 但是蒋文未能结合汉语史料探讨“要”如何吸收假设语境义、“要”的意愿意如何弱化以至消失, 从而真正触及“要”由意愿意助动词到假设连词的语法化机制和语法化路径。

4.2 汉语“要”从意愿意助动词到假设连词的语法化历程

汉语“要”从意愿意助动词到假设连词的语法化历程和闽南方言“卜”从意愿意助动词到假设连词的语法化历程有着惊人的相似。闽南方言“卜”从意愿意助动词到假设连词所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也正是汉语“要”从意愿意助动词到假设连词所经历的阶段。太田辰夫 (1987:307) 所提到的“若要”常常是两个词, 后又成为一个词, 这正是“要”由意愿意助动词语法化为假设连词的其中两个发展阶段。因此, 汉语“要”从意愿意助动词到假设连词的演变, 不只是像太田辰夫 (1987:308) 所说的“要”与“若、若是”交替那样简单, 也不只是像马贝加 (2002) 所勾勒的“要”的语法化和蒋绍愚 (2015) 所推演的“要”的演变过程那样单纯。

4.2.1 “要”语法化为假设连词的第一阶段

关于意愿意助动词“要”何时产生, 卢卓群 (1997)、马贝加 (2002) 等学者做过探讨。卢卓群 (1997) 指出, “要”用作“意志式”助动词, 义同助动词“欲”, 当出现在唐代。不过, 他同时又指出, “要”有“欲”义, 在汉人司马迁就有所察觉, 如司马迁将“将要而杀之”变作“欲杀孔子”, 似乎悟出了“要”中有表意志的助动词“欲”的内在语义。

马贝加 (2002) 认为汉代的助动词“要”具有表示主观意愿等功能, 即汉代已经产生意愿意助动词了。为此, 她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不过, 我们以为其中只有下面这个例子的“要”才表主观意愿, 但它不具有马文上述所说的另一解——若要：

(35) 侯草木之区别兮, 苟能实其必荣; 要[·]没世而不朽兮, 乃先民之所程。(*《汉书·叙传上》*)

可见, 意愿意助动词“要”出现于汉代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用例很少, 当属初始阶段, 主

要用于非假设句。

到了六朝时期,意愿助动词“要”已经与“欲”产生竞争了,出现了“欲要”和“要欲”的组合,尤以“欲要”的组合为多。这说明在“要”与“欲”的竞争中还是前者处于弱势。尽管如此,六朝时期意愿助动词“要”的用例已经比以前多了,而且已经可以用于非现实句了。进入唐代或唐以后,这类非现实句更是日渐增多。例如:

(36) 若以编户难齐,忧鄙论未立,是见二叔不咸,虑周德先亡,傥能伸以远图,要之长世,则日计可满,岁功可期。(六朝《全刘宋文》)

(37) 要闻除猰㺄,休作画麒麟。(杜甫《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

在用法和表义上,例(36)、例(37)里的“要”与例(6)至例(8)中的“要”并无二致。这两个例子中的“要”除了表意愿,还隐含着假设的意味,这是特定的语境赋予“要”特殊隐涵义,因此它实际上可以解读为“如果想要”。这类句子里的“要”正处于“要”向假设连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4.2.2 “要”语法化为假设连词的第二阶段

为了增加明晰度,提高表达力,由假设连词跟“要”组合的“若要”之类说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根据我们的考察,“若要”最早见于唐代的文献,这个时期的用例十分有限。进入五代以后,“若要”例子逐渐多了起来,甚至也出现个别“若要欲”或“若欲要”用例。例如:

(38) 若要添风月,应除数百竿。(韩愈《竹径》)

(39) 远公曰:贫道以念经为业,若要贫道驱使,只是此身;若要贫,只须莫贫道念经。(五代《敦煌变文选》)

(40) 是时有敕:若要听道安讲者,每人纳绢一疋,方得听一日。(五代《敦煌变文选》)

(41) 若要欲得眼亲逢,学取经文便合同,海水毛吞浑不异,须弥界(芥)纳事相容。(五代《敦煌变文集新书》)

(42) 若要破,须取相生相克之理。(明《水浒全传(下)》)

虽然“若要”中的“要”与“欲”存在着竞争,但是“要”处于绝对的优势,因此我们见到的几乎都是“若要”的用例。这些例子里的“若要”通过“若”的引导,凸显句子的假设意味,同时也增强了“要”的假设意味。尽管这时候的“要”还有明显的“想要”义,还算是一个意愿助动词,但是“要”已经在向假设连词的发展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跨入了第二阶段。

由表“如果想要”的“要”阶段向表“如果想要”的“若要”阶段发展,显然也是语言中的“省力”原则和“尽力”原则相互对抗、相互竞争、互为平衡的产物。

4.2.3 “要”语法化为假设连词的第三阶段

五代时期,已有个别“若要”用例开始出现“如果想要”和“如果”两解的情况了。宋以后更是可以见到如此用例。例如:

(43) 相公问牙人曰：“这个家儿，要多小（少）来钱卖？”牙人未言，远公进步向前启相公曰：“若要贱卖奴身，只要相公五百贯钱文。”（五代《敦煌变文选》）

(44) 若要说孔子去褒贬他，去其爵，与其爵，赏其功，罚其罪，岂不是谬也！（北宋《朱子语类》）

“若要”作为假设连词用，始见于宋代，并一直延续到民国。例如：

(45) 人若要洗刷旧习都净了，却去理会此道理者，无是理。（北宋《朱子语类》）

(46) 那个考官不肯道：“若要做第二，宁可不中。留在下科，不怕不是头名，不可中坏了他。”（明《初刻拍案惊奇（下）》）

(47) 北侠笑道：贤弟不要多心。劣兄有个贱恙：若要闲的日子多了，便要生病。（清《七侠五义（下）》）

(48) 这种妖鬼，大可以不必理他。古人说得好：“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若要怕他，或要怪他，那么他就要作怪了。（民国《上古秘史》）

同时清代乃至民国小说也出现“要若”用为假设连词的情况。例如：

(49) 刘云快来啦，他要若是来了的时候，我跟他答话，你们全都别言语。（清《三侠剑（中）》）

(50) 现在主上年幼，我三人职掌大权，要若遽受封爵，不免惹人议论，且将此事搁起。（民国《西汉野史》）

到了例(45)至例(48)，由于“若要”后的“洗刷旧习都净了”“做第二”“闲的日子多了”“怕他”都是非自主的行为状态，句中的“要”因其愿意义无从表现而彻底虚化为假设连词。例(49)和例(50)置于“若”前的“要”受“若”的语义制约更是彻彻底底的假设连词了。例(45)至例(50)里的“要”与“若”之类假设连词共存于一个句子里，处于竞争之中，从而进入了“要”向假设连词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从“要”由意愿助动词向假设连词发展的上述三个阶段，是说话人主观化不断增强的结果，也是“要”的语义由指向主语到逐渐指向说话人到最后完全指向说话人的过程。这跟闽南方言“卜”由意愿助动词向假设连词发展的前三个阶段完全一致。

4.2.4 “要”语法化为假设连词的第四阶段

假设连词“若要”中的“要”与“若”经过一个时期的竞争后开始慢慢胜出而能单独表假设义了。但是“要”单独用于表假定并非像太田辰夫（1987:307）所说的那样直到清代才出现，而是早在元代就已经可以见到这方面的零星用例了。例如：

(51) 鸽子说：“我儿，你发下什么新愿？”玉姐说：“我要再接王三，把咎一家子死的灭门绝户，天火烧了。”（《元代话本选集》）

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代末年，“要”用为假设连词的例子不断涌现，乃至一直流传至今天。例如：

(52) 狄奶奶息怒，还好合管家说，仗赖管家瞒过还好；要合老爷说了，小的担不起。

(《醒世姻缘传》)

(53) 我要不脱下来叫他穿上,冻着他心上人,我穿着也不安! (《醒世姻缘传》)

(54) 你如今要闹出了这个学房,再要找这么个地方,我告诉你说罢,比登天还难呢! (《红楼梦》)

(55) 你这么大个个子,好意思呀? 要我我就拉平板车去。(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

第四个阶段是假设连词“要”由萌生到不断发展的阶段。但是假设连词“要”和假设连词“若”以及“若要”一直并存到清代乃至民国初年。民国以后随着白话文的推行,与“要”相互竞争的“若”和“若要”之类假设连词便处于绝对的弱势。这便是汉语假设连词和闽南方言假设连词的差别所在。

五 意愿助动词语法化为虚拟成分的跨语言考察

这部分将着重考察与闽南方言“卜”相当的意愿助动词在英语等语言语法化为虚拟成分的情况,从中揭示包括闽南方言在内的汉语在这方面与它们存在的共性和个性。

关于英语等语言意愿助动词的语法化,Christian Lehmann(2002)、Joan Bybee et al.(1994)、Pok-Soon Kim(2002)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Christian Lehmann(2002:24)明确指出,情态动词(意愿助动词)“will”来源于动词“想要”义,后来又发展为表虚拟语气的助动词“would”。但是对“will”如何发展为表虚拟语气的助动词“would”,作者无具体的论述。

Joan Bybee et al.(1994:240-241)则详细讨论了“desire(想要)”义的语法化路径,认为该语义的发展是多路径的。他所拟测的路径中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的一条是:

desire>intention>future>probability>concessive。

根据desire、obligation、ability等词的演变情况,该文总结出情态义演变的规律,认为都要经历以下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Joan Bybee et al.(1994:212-213)同时指出,虚拟语气产生于从属用法的语境,而从属用法又是处于语法化很后面的阶段。

Pok-Soon Kim(2002)认为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是语用推理和隐喻性的延伸。其中,推理与概念的连续性有关。他从推理的角度也对“will”的语义演化进行具体的勾勒:

[will/would] desire > willingness > intention > prediction (future) > probability > possibility(> hypothetical: would)

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方语言意愿助动词的语法化路径既有共同的地方,也有根本的

差别。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可以发生意愿助动词向虚拟成分的演化,而且意愿助动词语法化为虚拟成分的过程都是主观化驱动的过程。根本的差别在于,汉语意愿助动词是向假设连词演变的,而英语等语言意愿助动词则是向表虚拟语气的助动词发展的。具体说来,这种根本性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汉语言里,意愿助动词向假设连词发展,中间无需经过 intention、future、probability 等环节的演化;而以英语为代表的语言,意愿助动词向表虚拟语气的助动词发展, intention、future、probability 等环节则是必经之路。如果要探究该差异背后的原因,我们认为,意愿助动词向虚拟语气发展,汉语主要是借助特定的语境一步一步来实现的,即推导义固化是其语义演变的主要机制;英语等语言则主要是依靠词义本身的引申实现其语义一步步的衍化。这无疑是东西方思维模式差异的真切体现。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古川裕 (2006) 的研究。古文从认知的角度解释“要”由动词到连词的语法化路径,认为“要”从动词到连词所形成的一系列语法化途径的语法动机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主观性”的作用,还有一条是“非现实性”的语义共性,从而勾勒出“要”的语义演变过程:主语的意愿 > 说话人的意愿 > 说话人的估计判断 > 假设。事实证明“主观化”和“非现实性”确实是汉语言助动词“要”向假设连词“要”发展的两大动因。不过,根据古文的研究,不管是“要”表说话人的意愿还是表说话人的估计判断,都与假设义是分开的。也就是说,“要”要衍化为假设义,中间需要经历上述两个语义阶段的衍化。然而这却与包括闽南方言在内的汉语的语言事实相背离。根据我们对意愿助动词“卜”和“要”语法化为假设连词的研究,尽管这个语法化过程也参入说话人的主观化倾向,但是说话人的主观意识与假设义是相生相伴的,是随着假设义的不断增强而不断浓厚的。这也是汉语与英语等语言存在着根本性差别的一个具体表现。可见,古川裕 (2006) 的观点和上述 Chang (2009) 的观点受西方语言学家观点的影响比较深。

二是,在汉语言里,意愿助动词向虚拟成分发展,不仅仅是语义上的演变,而且是语法功能的交替,即由助动词演变为连词。而英语等语言,意愿助动词尽管也向虚拟成分发展,但是并没有演变为连词,依然是做助动词用。汉语和英语等语言之所以存在这方面的差异,我们认为这是由两种不同的语言类型造成的。

Bybee (1997) 指出,跨语言的研究表明,分析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属性是缺乏强制性范畴,综合性语言通常具有特定的强制性语法范畴。(引自吴福祥 2006:124) 跨语言的研究 (Dahl 1985、Bybee& Dahl 1989) 显示,语法范畴的强制性程度跟其语法化程度密切关联:一个语法范畴的语法化程度越高,其强制性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引自吴福祥 2006:124) 汉语被认为是分析性语言,英语等印欧语被认为是综合性语言。在很多语言事实面前,的确,汉语是一种缺乏强制性范畴的语言,英语等语言是具有强制性语法范畴的语言。在汉语里,假设连词所处的位置十分灵活,既可以置于从句主语之前,也可以置于从句主语之后,还可以置于主语空缺的从句句首。“卜 / 要”作为助动词使用时,

其前常常出现主语,也常常因主语空缺而跃居从句句首。助动词“卜 / 要”不管所处的是哪个位置,都处于假设连词的语法位置上,这为其演变为假设连词创造了必要的句法条件。在英语等语言里,假设连词总是置于从句主语之前,而“will”作为助动词使用,必须置于主语之后,在从句里无法处于假设连词的语法位置上,因缺乏必要的句法条件而很难演变为假设连词。同样是表示虚拟语气,作为连词使用的“卜 / 要”,其意义比作为助动词使用的“would”来得更虚,也就是说其语法化的程度更高。这说明,语法化程度越高,其强制性也未必就越高。

六 结语

闽南方言假设连词“卜”早在明代嘉靖版戏文已经出现,不过我们仍能从历史文献和现实语料中窥见意愿助动词“卜”向假设连词“卜”演化的轨迹,即它是在非现实的语境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不仅是语用原则在起作用,而且是推导义固化的结果。具体呈现出四个发展阶段:1. 出现于非现实句,表“如果想要”;2. 与假设连词组合,表“如果想要”;3. 与假设连词组合,表假设义;4. 单独表假设义。意愿助动词“卜”语法化为假设连词“卜”的过程,也是“卜”的语义由主语指向转向说话人指向的过程。

关于汉语假设连词“要”的来源问题,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探讨,但是却无法解释和证明太田辰夫(1987:307-308)提及的“若要这个词常常是两个词,是‘若欲’(如果想要做……)的意思,又成为一个词,也用作单纯表假设的连词”的语言现象和其关于“先有这种‘若要’,后来把它看作是两个同义词的复合,就变成单用‘要’也能表假定的了”的猜测。通过借助大量历史文献和现实语料对汉语假设连词“要”来源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时,我们惊讶地发现汉语“要”从意愿助动词发展为假设连词也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语法化路径和闽南方言“卜”从意愿助动词发展为假设连词的语法化路径如出一辙。可见,闽南方言意愿助动词“卜”发展为假设连词“卜”的语法化路径具有类型学意义,为我们重新探索汉语假设连词“要”的来源提供了活生生的范例。与此同时,根据浩瀚而翔实的历史语料探索出来的汉语“要”从意愿助动词到假设连词的清晰的发展脉络,又为闽南方言意愿助动词“卜”发展为假设连词“卜”的语法化路径提供可靠的佐证。

通过考察可以看出,中西方语言有一定的共性,都可以发生意愿助动词向虚拟成分的演化,而且意愿助动词语法化为虚拟成分的过程都是主观化驱动的过程。然而,中西方语言却存在着根本差别。一是语法化路径不同,由此导致主观化的路径也不同。二是语法化的结果不同,汉语实现语法功能的交替,而英语等语言则没有。本文同时揭示了造成中西方语言根本性差别背后的原因。

附注：

①需要指出的是，“卜”作为助动词用时，闽台闽南方言辞典都只列出 a、b 两个义项。事实上，助动词“卜”的语义也得到不断的演化，其义项远不止这两项，但由于其他义项与本文的探讨没有什么关联，这里就不一而足了。

②《闽南方言大词典》（周长楫 2006:693）指出：《集韵·质韵》直质切：“挾，《尔雅》：获也。”

③事实上，“卜”和“挾”不为闽台闽南方言所独用。李如龙（2013:77–82）指出，它们是沿海闽语地区两个常见的口语特征词。其中，“卜”分布的地区比“挾”广。在各地闽语中，“卜”和“挾”不论是用字还是读音、意义或用法都有许多差异。值得一提的是，李先生（2013:82）还认为，以“挾”作为 [tih] 的本字证据不足，这个特征词可能另有来源。

④本文所用的历史文献主要来源有三。一是明清时期用闽南方言写成的戏文，具体有明嘉靖刊《荔枝记》（1566 年）、清顺治刊《荔枝记》（1651 年）、清光绪刊《荔枝记》（1884 年）。这些版本由台湾学者吴守礼分别于 2001 年（a、b、c）重新校注出版。虽然它们讲述的都是同一个故事——泉州人陈三和潮州人五娘的爱情故事，但它们并非同一个版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刊，而是反映三个不同时代的方言风貌。二是台湾歌仔册。一般认为歌仔册产生的年代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三是北京大学语料库古代汉语部分。

⑤这里的“现实语料”包括现代闽南方言书面语料、口语语料和北京大学语料库现代汉语部分。现代闽南方言书面语料使用的主要是台湾闽南语故事集语料库，具体包括台湾云林县、高雄县、台南县、南投县、宜兰县、苗栗县、彰化县、嘉义市以及沙鹿镇、大甲镇、东势镇、清水镇、外埔乡、新社乡、大安乡、石冈乡闽南语故事集以及罗阿峰、陈阿勉故事专辑。闽南地区的真实口语语料为作者调查所得。

⑥ Chang 文里的 beh 就是本文所说的“卜”。

⑦ Chang 文里的“条件”就是假设，“条件标记”就是本文所说的假设连词。

⑧ Chang 文把闽南方言假设连词“若”或“那”记为 na。

⑨为了与本文其他例子的体例保持统一，下面三个例子的中文翻译和出处是笔者加上的。

⑩ Zipf 早期（1949）提出“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和“尽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sufficient effort）。（引自沈家煊 2004）Hopper 和 Traugott 后来（1993：64）也提出“省力”和“明晰”两条原则。Hopper 和 Traugott 与 Zipf 的思想是一致的。所谓“省力”原则，就是说话人为自己着想，图自己省力，它导致语言的简化和统一；所谓“尽力”原则，就是说话人为听话人着想，为对方尽力，让对方明晰，它导致语言的复杂和变化。

⑪未摘录的例子我们认为作为论据是不妥的，因为作者对句中“要”的解读有失妥当。

⑫马文（2002）对例 27 中“要”的解读，我们并不认同，下文将会涉及。

参考文献：

曹志耘 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曼君 2015《闽南方言情态动词补语“卜”的产生、演变和消亡》，刘丹青、李蓝、郑剑平主编《方言语法论丛》（第六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曼君 2017《闽南方言助动词“卜”的语义演变》，《集美大学学报》第 4 期。

董忠司 2001《台湾闽南语辞典》，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古川裕 2006《关于“要”类词的认知解释——论“要”由动词到连词的语法化途径》，《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

- 蒋冀骋、吴福祥 1997 《近代汉语纲要》,长沙 : 湖南教育出版社。
- 蒋绍愚 2015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李如龙 2013 《闽语的“卜”和“挫”》,张嘉星主编《第十一届闽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卢卓群 1997 《助动词“要”汉代起源说》,《古汉语研究》第 3 期。
- 马贝加 2002 《“要”的语法化》,《语言研究》第 4 期。
- 沈家煊 2004 《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 太田辰夫著,蒋绍愚、徐昌华译 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吴福祥 2006 《语法化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合肥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吴守礼 2001a 明嘉靖刊《荔镜记》,台北 : 从宜工作室。
- 吴守礼 2001b 清顺治刊《荔枝记》,台北 : 从宜工作室。
- 吴守礼 2001c 清光绪刊《荔枝记》,台北 : 从宜工作室。
- 周长楫 2006 《闽南方言大词典》,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Chang, Miao-Hsia 1999 Discours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 synchronic study of the Taiwanese modal verb *beh*.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ed. by H. Samuel Wang, Feng-fu Tsao, and Chin-fa Lien.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 Chang, Miao-Hsia 2009 Metaphorization and Metonymization-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Verbs of Volition in Southern Min,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7. 1.
- Christian Lehmann 2002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2nd, revised edition. Erfurt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der Universität.
- Hopper, P. J. & Traugott, C.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an Bybee, Revere Perd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Chicago & 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k-Soon Kim 2002 English Modal Auxiliari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Chain. *The Journal of Linguistic Science*, vol.22.

【作者简介】陈曼君,女,福建惠安人,文学博士,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后,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语法、语义演变、方言保护及应用等研究。邮箱 : dawn269@163.com。

【责任编辑 : 余月】

of conventional classification indicators in the onomasiological structure changes from changeable to les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attributes change from implicit components to prominent component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multiple-word expressions, and the proportion of complex lexical constructions including cumulative, overlapping and juxtaposition is increasing gradually; The “sememe-morpheme” matching relationship in the onomatological layer has changed from “many to one” to “one to one” and “one to many”. Through case studies, we can reveal the naming process of Chinese noun words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and comprehensively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extraction methods of conceptual elements and the selection and matching of language forms.

Key Words : onomasiology; clothing; lexical construction; onomatology; qualia structure

CHEN Man-jun, The Origin of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 “卜” in Southern Min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g and Qing Drama——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 “要”

Abstract : In Southern Min dialects, the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 “卜” gradually develops in an unrealistic context from willing auxiliary verb “卜”. It has undergone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 Not only is the pragmatic principle at work, but it is also the result of the implicature being solidifie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willing auxiliary verb “卜” turning into the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 “卜” is also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semantics of “卜” changes from subject-oriented to speaker-oriented. The process, as a living example for us to rediscover the source of the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 “要” in Chinese, has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Through investigation,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commonalities and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auxiliary verbs into hypothetical components, and explain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Key Words : Southern Min Oper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Southern Min dialects ; hypothetical conjunction ; grammaticalization ; typological meaning

YUAN Shu, The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Nature of *Yuanruo Yunbian*(《渊若韵辨》)

Abstract : *Yuanruo Yunbian* (《渊若韵辨》) is a rhyme dictionary compiled by Ji Tong, who came from Zhangqiu County of Shandong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ystem of *Yuanruo Yunbian*, and comparing it with modern Chinese dialect,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dialectal foundation of *Yuanruo Yunbian* is Zhangqiu dialect around the 1760s. The numerous phonetic materials reflecting Zhangqiu dialect retained in *Yuanruo Yunbian* can provide important literature support for researching the phonetic evolution of Zhangqiu dialect in the past 200 years.

Key Words : *Yuanruo Yunbian*(《渊若韵辨》) ; Zhangqiu dialect ; phonological nature